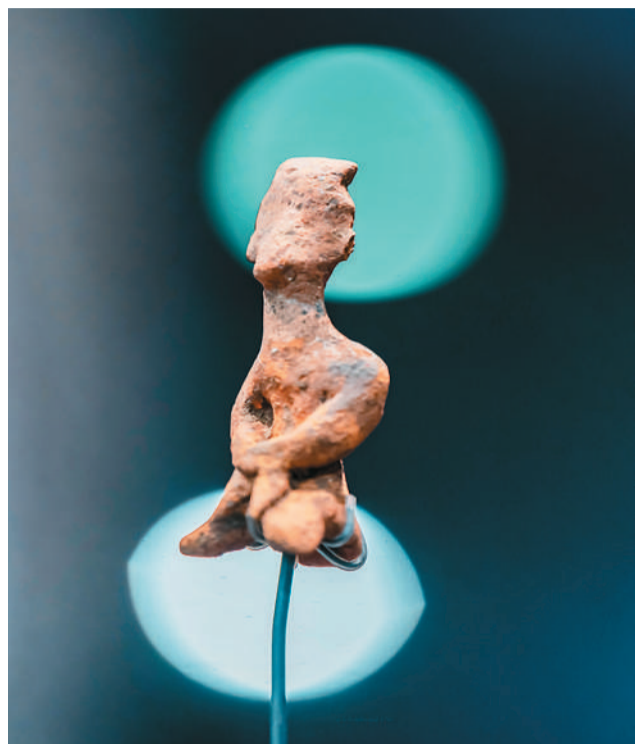


湖北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开馆

解码长江中游古国文明

本报记者 田豆豆



▲石家河文化时期陶塑人像。



▲后石家河文化时期虎座双鹰玉饰。

本文图片来源：天门市文化和旅游局

位于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的石家河遗址，总面积约8平方公里，是长江中游地区迄今发现面积最大、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的新石器时代大型城址聚落，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2025年被列入国家首批重要大遗址名单。石家河遗址及其命名的石家河文化，是楚文化的源头，代表了长江中游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今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该馆以“长江之光·文明之源”为主线，分为遗址时空、古城恢弘、古国气象六大展区，遴选800余件石家河遗址出土文物，其中近八成成为首次展出。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表示，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不仅系统展示了石家河考古成果，还还原了早期古国风貌，更搭建起解读长江中游文明、普及中华文明探源成果的重要平台。

折射不同时期文化面貌

在博物馆序厅，伫立着一座头戴羽毛冠冕、右手高举斧钺的古国首领雕像，引领观众进入距今5900年—3800年的历史时空。石家河遗址所处的年代，大致属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划定的古国时代，这一时期，中华大地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石家河遗址历经70多年考古研究，发现了大型城址、祭祀场所、制陶作坊、玉器器作坊、古稻田和水利系统等重要遗迹。遗址出土的不同时期文物，蕴藏着长江中游史前文明传承发展的“基因密码”。

石家河遗址历经油子岭文化(公元前3900年—公元前3100年左右)、屈家岭文化(公元前3100年—公元前2500年左右)、石家河文化(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2200年左右)、后石家河文化(公元前2200年—公元前1800年左右)4个考古学文化时期，形成了完整的文化谱系。石家河遗址出土的陶器种类繁多，包括生活用具和陶塑等艺术品。展厅里展示了不同时期的代表性陶器，折射出时代的变迁。

油子岭文化时期的带盖广肩罐，外表呈红色，表皮脱落处露出橙色的底色，不像后期红陶器内外颜色一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双腹豆和黑陶罐是这一时期独有的器物。双腹豆因腹中部内收形成双腹而得名，造型独特。黑陶罐采用磨光黑陶技术制作，胎体薄如蛋壳，线条流畅，内外光滑，其工艺之精，今人都难以完全复制。



▲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玉神人头像。

从屈家岭文化晚期到石家河文化时期，石家河先民制作了大量彩陶纺轮，有橙黄、橙红、黑褐、红褐等不同颜色，纹饰多样，反映了石家河纺织技术成熟，在同时期处于先进水平。

石家河邓家湾遗址出土了大批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小型陶塑，一座坑中达数千件之多，有鸟、鸡、猪、狗、羊、虎、象、猴、龟等动物，说明当时石家河地区气候湿润，物种丰富。此外，还有或坐或

舞的人像，造型简约而生动，具有独特的美感。其中，有一件陶塑人像呈蹲坐姿态，手臂弯曲托腮，做思考状，肢体线条简化却充满张力，与法国雕塑家罗丹的名作《思想者》颇为相似，被称为“东方思想者”。抱鱼人像为跪坐姿态，高鼻突耳，头戴冠，冠两侧出角，双手抱一鱼于腰间，专家推测这一形象或与祭祀活动有关。

红陶杯也是石家河文化的典型器物。考古工作者在石家河三房湾遗址发现了约8000平方米的制陶窑址，堆积厚度达1.2米至2.4米，土层里密密麻麻埋藏着超过200万个红陶杯，年代跨度从屈家岭文化晚期至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展厅的一面墙上，整齐排列着遗址出土的数百个红陶杯，颇具视觉冲击力。据专家介绍，这些红陶杯功能之一是用来饮酒，说明石家河饮酒之风盛行，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粮食富足，可用于酿酒。

展现史前制玉工艺巅峰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国时代的祭祀仪式，已具有凝聚族群认同、巩固治理秩序的重要意义。

石家河古城在石家河文化时期发展到顶峰，面积近350万平方米，由内城、城壕、外郭城构成，环壕周边分布着普通居住区、祭祀区、手工作坊区、墓葬区等，其中，环壕西部的印信台是长江中游地区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的史前祭祀遗址。展厅里复原展示了印信台套缸遗迹，数十个形制相似的红陶缸去掉底部，相互套接，呈线状排列，长达20多米，缸上刻划着日月、号角、圆圈等符号，已具备原始文字的基本特征。

史前时期，玉器常被作为沟通天地的祭祀礼器。石家河遗址共出土400余件玉器，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采用圆雕、透雕、减地阳刻、浅浮雕线刻等工艺，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

石家河遗址是龙凤玉器同时出现的最早遗址。1955年出土于石家河遗址罗家柏岭的玉团凤，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圆形玉片上透雕出凤身，形象飘逸，被认为是凤文化的重要源头。石家河遗址肖家屋脊瓮棺中出土的玉龙，现藏于荆州博物馆，龙体弯曲呈球形，是长江中游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盘龙形象玉珠饰，被称为“湖北第一龙”。博物馆大厅有仿照出土文物设计的大型龙凤浮雕，吸引了许多观众拍照打卡。

玉器展厅里集中展示了玉神人头像、连体双头人像、虎座双鹰玉饰、玉牌饰、玉虎、玉鹰等石家河代表性玉器。它们虽然形体较小，但做工精细，造型生动。

玉神人头像头戴平顶冠，梭形大眼，蒜头宽鼻，



▲参观者走进“时空隧道”。

阔口龇牙，与三星堆青铜人像相似，时代早了数百年，专家认为三星堆人像造型或许受到石家河文化影响。不仅是三星堆，河南二里头和殷墟、湖北盘龙城等夏商时期遗址，也发现了与石家河玉器相似的器物，为研究石家河玉文化的流传提供了重要线索。

虎座双鹰玉饰雕刻精美，造型对称，与楚文化代表器物虎座鸟架鼓有异曲同工之处，体现了石家河文化与楚文化的联系。玉饰底座为方头卷耳的玉虎头像，上部为一对相向站立的鹰。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件玉器还有“隐藏纹样”——双鹰与虎座间的镂空处，形成了蹲踞的蛙形轮廓。从侧面看，玉鹰的弯钩形喙不足绿豆大小，可以活动却无法取出，技艺之精巧令人叹为观止。

让古老文明可触可感

四五千年前的房屋和城壕是什么样？石家河先民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史前陶器生产要经过哪些工序？为了让古老文明可触可感，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引入数字技术和多媒体展陈手段，让沉睡数千年的文物“活”了起来，生动讲述历史故事。

展厅里，数字沙盘清晰呈现了石家河遗址的恢宏格局和丰富内涵，背后的巨幅展板将石家河古城与长江流域其他史前城址进行比照，让观众直观了解其规模与地位；大屏幕上的视频复原了房屋、城壕等重要遗迹，再现了石家河先民的祭祀仪式和生活画面；全息投影多角度动态展示陶塑人像和动物，彰显了史前艺术的魅力；重点文物展柜上设有互动触屏，指尖一点，便能了解文物的纹样特征、象征意义等；电子制陶互动区内，可以通过体感设备模拟体验拉坯烧陶……

参观完展览，走进演艺中心，《看见石家河》沉浸式实景剧正在精彩上演。

“石头！我的孩子，你回来了吗？”舞台一侧，山石嶙峋的布景中，新石器时代的母亲亲昵呼唤；舞台另一侧，一位当代考古工作者在玉团凤幻化的凤凰引导下，从石家河遗址考古现场“穿越”到数千年前。观众随着他的脚步，走近石家河先民勤劳耕种、勇抗洪水、祭祀天地等场景。

不同于传统舞台剧，《看见石家河》不设固定观众席位，采用移步换景的行进式观演模式，让观众以文明发现者的身份沉浸入戏。该剧自博物馆开馆后便一票难求，场场爆满，深受观众欢迎。

作为石家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不仅是收藏历史的时空，更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通过科技赋能、艺术呈现，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让当代人深刻感受到五千年文明一脉相承、生生不息。

▼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外观。



▲“千年回响——大唐北庭文物展”现场。山西博物院供图

近日，“千年回响——大唐北庭文物展”“明月出天山——阜康市丝路文物展”在山西博物院开展。两大特展分别由山西博物院与昌吉州文博院(博物馆、北庭研究院)、阜康市博物馆联合主办，汇聚数百件珍贵文物，再现丝绸之路天山北道的繁荣景象，实证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有效管辖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久历史。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地处天山北麓，自古为西域咽喉、北疆屏障。公元前60年，西汉设西域都护府，正式将新疆地区纳入中国版图；公元702年，武则天设立北庭都护府，与安西都护府分治天山南北。北庭故城坐落于昌吉州吉木萨尔县，是唐代天山北麓的军政中心与丝路北道枢纽。同属昌吉州的阜康作为北庭下辖的守城，与北庭故城共同见证了大唐经略西域的历程。

在“明月出天山”展厅，木质耳杯、带柄铜镜等文物，诉说着汉唐东西方文明在阜康地区交融碰撞。耳杯是中国古代一种椭圆形、浅腹、平底、带双耳的器物，也称为羽觞，在汉代用于盛酒、奠或其他食物。这种耳杯出现在阜康，反映了两汉时期中原文化和生活习俗传入新疆。

一面带有修长手柄的铜镜格外引人注目，镜背雕刻古希腊风格男性人像，柄身饰有精美植物纹样。据介绍，这种带柄铜镜早期流行于地中海地区，后经中亚巴克特里亚传入西域，在战国至两汉时期来到新疆。汉代丝绸之路全线贯通后，这类铜镜传入中原，并经历了本土化改造。

“千年回响”展厅里，北庭故城出土的莲花纹方砖、兽面纹瓦当等构件，再现了唐代北庭都护府的城市建筑风貌。考古研究证实，北庭故城遵循中原府营筑规划，采用“子城—罗城”双重城结构，城墙夯筑、城门结构、官署布局与唐长安城、洛阳城一脉相承。莲花纹方砖出土于北庭故城内城，呈正方形，图案为多片莲瓣环绕圆心绽放。据介绍，这种莲花纹方砖在唐代属于高级建材，专用于皇家与高阶官署，是等级与地位的象征。莲花纹方砖的发现，表明北庭都护府的级别较高，实证此地沿用了中原建筑礼制。

唐代北庭推行正州与羁縻府州结合的治理模式，构建起“军—守—镇—城—烽—戍”多级军事防御体系，同时大力推行屯田戍边，实现农牧并举。阜康作为北庭都护府下守镇，见证了各民族在此和谐共处。阜康出土的唐代海兽葡萄纹铜镜、白釉盏、茶叶末釉盏等文物，折射出中原与西域文化并存相融的图景，让观众感受到大唐丝绸之路上的烟火气息。

展览还讲述了山西与新疆的历史渊源。元代忽必烈时期，从太和岭(今山西大同)至别失八里(北庭)设立30个驿站，打通了晋疆交通驿道。明清时期，晋陕商帮通过万里茶道经新疆远赴中亚、俄罗斯等地进行商业贸易，在沿线建立了许多会馆。清代取“物阜民康”之意设阜康县，阜康山陕会馆是晋商在西域的重要据点。虽然原会馆已不存，但当地在原址上复原了会馆轮廓，以纪念各民族共同开发边疆的历史。

“明月出天山”展览结尾，山西博物院藏提篮茶盒与阜康市博物馆藏铜执壶并列展示，共同勾勒出清代茶叶贸易串联晋疆两地的历史图景。提篮茶盒由竹篮和一壶两杯组成，便于长途旅行时携带，被称为“清代晋商的随身杯”。铜执壶多为奶茶壶，上面的纹饰以几何纹和植物纹为主，具有吉祥寓意。

据悉，两场特展将持续至10月7日。



▲汉代带柄铜镜。山西博物院供图

国博推出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

本报电(记者邹雅婷)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主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日前在国博开幕。卡塔尔地处阿拉伯半岛东部，三面被波斯湾环绕，沙漠广布，干旱少雨。自18世纪至石油时代，卡塔尔的贝都因人逐水草而居、随季节迁徙，构建起守望相助的部落社群，孕育出独具特色的游牧生活。

展览从游牧民形象、牧民的居所、身边的生灵、熟悉的土地、生活的艺术、转型的生活6个方面，生动展现卡塔尔的游牧生活和他文化。展品丰富多样，包含150余件(组)珍贵文物藏品、摄影作品及影像资料。其中，既有帐篷、摇篮、猎鹰护腕、拉巴巴琴、装饰带等生活用品和艺术品种，又有口述历史实录、文化人类学影像片段等。

尾厅呈现了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创作的艺术作品《迁徙记忆图谱》，通过当代艺术语言表现卡塔尔游牧民的迁徙记忆与文化遗产，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游牧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新疆双展亮相山西博物院

再现天山北麓丝路风华

本报记者 邹雅婷